



一年一度的高考虽已落幕,但舆论场的余波仍在。毛坦厂高考工厂的壮举,引来各方争论,关于寒门能否出贵子的问题被反复探讨。对高考的推崇,正说明了人们对寒门出贵子的殷切期待。但对毛坦厂模式的抨击和嘲讽,又可看出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价值观正在瓦解和转变。

寒门出贵子遵循这样的逻辑:经历过贫困和苦难的学子,更容易激发出斗志,通过发愤图强获得成功。这曾经是一种奢侈,在隋唐之前,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,社会阶层固化,所谓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世族”,“拼爹”成风。西晋寒士左思就曾写道:“世胄蹑高位,英俊沉下僚;地势使之然,由来非一朝。”隋朝出现的科举,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。“朝为田舍翁,暮登天子堂”是极具吸引力的广告语,寒门出贵子也成为一种被认可的价值观。“十年寒窗无人问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”古代社会的奋斗轨迹在现代中国依然适用,1978年恢复高考后,许多人改变了命运,高考也一度成为社会公平的象征。

当时的社会现实是,穷人多,富人少,社会阶层的上升相对顺利。如今社会的主流声音早已改变,因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正在日益壮大。人民日报最近发文指出,中国目前正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,从2024年开始将进入高收入阶段。瑞信研究院发布的《2015年度财富报告》称,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%,达1.09亿人。

在过去的40年中,借助高考,无数寒门子弟实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的飞跃。他们不一定都能跻身精英阶层,但大多数都突破了自身阶层的天花板。

前几天,知名媒体人朱学东发表了题为《我为什么不让孩子读四大名著和中国的儿童文学》的文章,引起广泛争议。究其原因,朱先生说中国儿童文学粗制滥造倒在其次,最主要的恐怕是他摸了四大名著的老虎屁股——你知道现今有多少人靠研究这四本书混饭吃吗?砸人家的饭碗,人家当然是要跟你拼命的。

这场骂战为我们提示了两个值得惊奇的事实:第一,在中国这个人均读书量可悲的国度里,居然有如此多的人为给孩子读什么书而操心。其次,我们居然如此迟钝,到今天才开始讨论四大名著是否少儿不宜,足见我们的读书量确实可悲。

与今人把四大名著为首的中国古典小说捧上天、当做“古典文学经典”交给孩子钻研不同,小说在古代中国的地位是相当之惨的。这一点从“小说”这个名字里就能看出端倪。“小说”者,小道消息也,从肇始的那本《太平广记》开始,中国小说就打上了给皇上或者草民一说一乐、当不了真的不严肃特质。到了明清,皇上们想把传媒彻底关起来,更是对半谣言色彩的文学类别严加打压。然而,历史的讽刺在于,正因为政府不鼓励,让小说得以破罐子破摔,打开了“政治正确”的桎梏,于是才有值得后人一吹的“明清小说”的高峰。

然而,这段经历也有个

从『寒门贵子』到『老公思聪』

【第三只眼】

□魏新丽

父辈们从泥土中拔出双腿,子辈则成为新兴市民。这些新晋中产阶级开始掌握话语权,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。他们对于贫穷已经没有太多切身体验,因而体现出一种疏离和嫌弃。相反,对金钱的渴望和追捧变得光明正大。

所以,年初上海女子江西年夜饭事件得以迅速发酵,这正是底层与中产之间的一次激烈碰撞。这不仅是物质上的

差距,更是观念、文化的差距。而朋友圈中,《我为什么拉黑了朋友圈的穷人》之类的文章广为传播。在各大论坛,对出身寒门的凤凰男女的讨伐也层出不穷。在此背景下,贫穷甚至成为一种原罪,是衣服上要藏起来的污垢。

贩卖苦难的励志故事也渐渐失去市场。典型的例子是,在近些年的草根选秀节目上,已经鲜少看到真正的底层之人。出身农村的“大衣哥”可能算是极少的特例,他从“星光大道”走出,而这个节目的受众恰好是70后以上年龄段的人群。受众更为年轻的“中国好声音”等节目,已绝难看到“大衣哥”这样特征鲜明的真正底层。参加选秀的选手,大多受过良好教育,至少是中等家庭出身。而时下自称草根的人群,很大一部分恰是中产或者中产的预备役。

总之,这个时代已经不再大张旗鼓地歌颂苦难之下的努力,而是更看重出身背景带来的平台、学识、眼界、资源和人脉优势。眼下对王思聪的追捧就顺理成章了。作为中国最典型的富二代,他既有接地气的一面,同时又自带炫富光环。对他的追捧,代表着富人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的时代到来。他们被摘下“为富不仁”的帽子,成为全民偶像。经常有

人说,“可怕的是那些比你你有背景还比你努力的人”,比如柳传志的女儿柳青的奋斗史,让很多人大呼,一个努力的富二代,让我等草根完全没有活路。

一边对寒门出贵子仍心存期望,一边哭着喊着叫思聪老公,这反映出中间阶级的焦虑和不安。他们害怕阶层下移,沦落为“下流阶层”,时刻保持着对“破产”的恐慌。于是,他们寄希望于社会阶层的流动,以使自己获得上升的空间,同时又要与下面的阶层划清界限,怕一不小心又跌落其中。而通过对王思聪等成功人士的追捧,他们又借此与上面的阶层建立链接,得到一种安全感。“有钱即正义”,有钱,就可以维持阶层的稳定。

40年间,成功学已转向。寒门出贵子的世界观仍在,但方法论已经在坍塌的道路上。寒门子弟主要的晋升通道越来越狭窄。高考虽然相对公平,但提供的流动性已经大不如前,所能撬动的天平越来越有限。以北大为例,2000-2010年间,农村新生仅占10%,而上世纪80年代-90年代这一比例是30%。对于很多底层人民来说,通过高考出人头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

如果说父辈们依然天真地相信奋斗改变命运,那么,现在的年轻人早就看清了现实,看清了贫富差距造就的巨大鸿沟。这种觉悟伴随着阶级固化的进程而加深。因此,在感情上,大家依然期待寒门能够出贵子,希望中下层通过努力跨越阶层的壁垒。但是理智上,人们已经逐渐在天平上加大了出身背景的砝码。是“寒门贵子”还是“老公思聪”?嘴上说不要,身体很诚实,选择其实已一目了然。

过给儿童专门编故事。近代以前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与今天的父母刚好是反着的,他们鼓励孩子尽早接触那些“很黄很暴力”的东西,以便了解真实世界的残酷。“儿童文学”概念的提出者是法国大思想家卢梭,他在《爱弥儿》中对儿童的天性极为推崇,将他们描述成了最纯真、最善良的群体,反对把“成年之后的罪恶”灌输给儿童,号召给这群“最善良的人”写专门的文学故事。在他的号召下,一批大思想家开始将那些流传已久的传说轶事过滤加工,编成儿童文学讲给孩子听。从那时开始,西方儿童文学的创作者就是作家群体中最有理想的群体,而儿童文学则是一种难度极高、备受尊重的文学创作形式。反观咱们中国,由于没有卢梭那个认识高度,“编给孩子听的故事”至今仍是故事情节简单粗陋、逻辑经不起推敲的代名词,大部分作家只有在正经文化圈里混不下去了才会想起写儿童文学。这就难怪朱学东要感叹中国儿童文学如此粗糙了。

不过,中国儿童文学被边缘化倒也不一定是坏事,四大名著逆袭的经历为我们提示了中国文学的独特规律——当你被边缘化了,没人管了,你反而有可能成功。如此说来,中国儿童文学可能也会有雄起的那一天。只不过到时所产生的成果到底是否还是“儿童文学”?会不会变得跟四大名著一样少儿不宜?这事儿,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【所谓潮流】

分答的游戏 认真你就输了

□俞耕耘

前日当朋友问起,你了解分答吗?我一愣,脑海里闪过一款昔日的碳酸饮料“芬达”。呵呵,幸好我没出声,否则难免有“聋子瞎打岔”的尴尬。默默在网上一搜,原来它是果壳开发的语音付费问答应用,走俏蹿红,成为所谓“知识变现”的新通道。

“分答”,望文生义,即一分钟的回答,秒秒都能变钱。它带来福音,仿佛大量“知道分子”终于迎来春天,奏响了“知识就是硬货”的诱人序曲。表面看去,分答的飙红颠覆了知识免费廉价、理应共享的强盗逻辑,将“付费才能共享”作为一种思维意识,输入到当下每个人的大脑皮层沟回里。

事实上,这不过是一次“知识意淫”的游戏。分答完美做到了“游戏产品的开发”:提供游戏平台,设定游戏规则(怎样分成、如何偷听),至于提问者、回答者,不过都是玩家而已。从王思聪引爆分答,就能看出其中端倪:这将是网红、明星和大咖们“暴露”,展示的又一战场。也许有人会说,这样看是否太过褊狭?毕竟很多行业能手、专业人士都已进驻这一平台答疑解惑。然而,分答的规则决定了它的高度和深度。它一面将付费阅读的好习惯借用、推广,一面又无力提供知识获得感。如果动动脑,就会发现“一分钟语音能回答的问题”往往既不是专业知识,也并非心得体会,它充其量不过是常识、判断、情绪、套话或隐私。当你去门诊问医生几个为什么,医生会不屑地告诉你:“我学了那么多年,三两句就能给你说明白?”60秒能给你传授知识,你以为分答是“大师集结号”?

这里还未包含:口齿不清、口吃结巴、南腔北调、一堆“然后”废掉的秒数。要清楚地总结陈词,就需要回答者字正腔圆、字字珠玑、句句箴言。你以为每个回答者都是辩论赛选手?“必须用语音回答”这个规则,纯属出于游戏的猎奇。其实,它的用意很明显,利用语音牢牢圈住一批声控人群的癖好。声音永远不会和知识有关,却能满足一些提问者的想象。“偷听”的耳朵甚至能听出这声音是否性感、知性、狂野或者公主病。

“偷听”的功能更值得我们玩味。我想它足以让你检讨:你是否总在各种聊天群里默默潜水,窥视别人聊天?分答告诉你,白听没戏,交出一块钱,才能“偷听”。这真是一个格调不高的“进步”——偷窥是可以的,但要付费。“偷听”功能的收益由提问者和回答者平分,甚至“偷听”的收益远远超出提问者的支出成本。这种规则简直具有了隐喻意义:收益在于提问者噱头挖掘和回答者隐私暴露的配合演出。越能引起“偷听”的问题,越是好问题。

变现思路无疑催生了一批所谓“中国好问题”:请问富豪你买不来啥东西?请问你的择偶标准是啥?请问你在女朋友身上花多少钱?难道这些提问者都是“狗仔”退化而来?

大批网红的狡黠在于,他们的回答用废话代替假话,说了套话却不讲真话;遇到长问题会说:详见我的文章链接,遇到不会的又说,我把钱私下退给你。分答也暗合了一种平庸的懒人思维,所谓“轻盈地获取”就是用别人的脑子回答自己的问题。你的脑子是否寄存在别人的篮子里?也许这种“上纲上线”很没必要,回答与提问本就是娱乐精神的表演和围观。

知识变现,共享经济或许只是分答的口头禅,潜台词却是在说:我们只是游戏,认真你就输了。看病要去医院,学习要去读书,经验要凭实践,成功需要教训。分答其实只提供缩水版的鸡汤、脑筋急转弯的小聪明、付费版的真心话大冒险等诸多玩法而已。

为什么『少儿不宜』四大名著

【文学论坛】

□王昱

副产品:小说既然是“体制外文学”,当然不会考虑少年儿童读者的需求,相反,由于皇权专制下的平头百姓们平素正能量看得太多了,到了皇上管不着的地方当然要越重口味越好,而作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跨越重重阻碍来看,当然要写得越重口味越好。在这些“重口味”桥段中,读者最喜闻乐见的是宣传“造反有理”:《三国演义》中还文绉绉地讲“天下土地,唯有德者居之”,等到了《水浒传》里,好汉们想得就比较直

白了:“杀奔东京,夺了那皇上的鸟位”,到了《西游记》里更绝,从石头缝里蹦出的猴子居然把玉帝打下宝座了。

其次,小说中暴力情节比比皆是,《三国演义》里猎户杀了妻子把肉献给刘备下酒,《水浒传》中李逵劫法场排砍人头,林冲风雪山神庙对昔日好友剖心挖胆,凡此种种,如果我国产电视剧像某些人呼吁的那样“忠于原著”,估计血腥程度绝不会在美剧《冰与火之歌》之下。

再者,情色也是小说中少不了的桥段,明代版四大名著(那时叫“四大奇书”)中是有《金瓶梅》的,如果曹雪芹后来没有写《红楼梦》顶了它的缺,四大名著对少儿宜还是不宜估计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了。然而饶是如此,在替补上场的《红楼梦》中,贾宝玉同志开场就在梦中与警幻仙姑那啥,醒了又跟袭人那啥,再后来又跟嫂子秦可卿那啥——说这些桥段都适合给孩子看恐怕绝非实话。

所有小说都是有写作目的的,而“体制外文学”出身的四大名著最初的写作目的其实就是发泄,让作者和读者狠出一口在现实中被礼教和皇权压抑已久的气,所谓文学价值即便有也排在这个目的之后。所以它们确实不适合儿童读,因为那是被憋出来的东西。

不过话又说回来,所谓“儿童文学”本就是很晚才出现的概念,18世纪以前,无论东方还是西方,其实都没想